



东方哲学史

(近代卷)

徐远和 李甦平 周贵华 孙晶 主编

组稿编辑:陈亚明 方国根

责任编辑:洪 琼

封面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哲学史(近代卷)/徐远和等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01-008307-0

I. 东… II. 徐… III. 东方哲学—哲学史—近代 IV. B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2925 号

东方哲学史

DONGFANG ZHIXUE SHI

(近代卷)

徐远和 李甦平 周贵华 孙晶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4.5

字数:500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978-7-01-008307-0 定价:93.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引言*

近代,对于东方社会而言,是西方全面推进政治、经济殖民化的时代,也是东方奋起反抗这种殖民化的时代。在此殖民与反殖民的过程中,东方社会以及东方传统文化都受到了猛烈冲击。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古代传统与现今发展之争,即“东西古今”文化之争,成为近代东方哲学的时代主题。面对这一历史哲学问题,印度哲学、阿拉伯伊斯兰哲学和东亚哲学都针锋相对地作出了自己的回应。这些构成了近代东方哲学的基本内容。

早在 15 世纪末,西方殖民主义者就已经开始入侵印度,到 19 世纪中叶,英国排除其他外国势力,最终使印度沦为自己的殖民地。为了振兴国家和民族,印度教的先进思想家掀起了一场以宗教改革为先导的思想启蒙运动。这场运动持续近百年之久,其重要领袖人物为罗姆莫罕·罗易、达耶南陀·萨拉斯瓦蒂、罗摩克里希那及其弟子斯瓦米·维韦卡南达等。他们虽然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民主政治持某种程度的开放立场,但在精神上严格秉承传统价值观,其哲学思想的发展基本都渊源于古代传统,特别是深受吠檀多哲学的影响。吠檀多哲学的基本理论是“不二论”,主张“梵”是一种纯存在,是宇宙的最高本体、万物的始基和创造者;在它之中既没有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也没有属性、数量和质量;但它作为整个宇宙的基础,世界任何现象,不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活动,都是它的显现(幻现)。而它所“幻现”出来的宇宙中的这一切,不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其存在都是虚假的,或者只是次级真实的;是价值判断的对象与

* 李甦平撰。

产物,即有善有恶等;是特殊的差别物,而非同一的。这样显示的“梵”在本质上是超越的,而在现象上又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吠檀多不二论”哲学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印度近代宗教改革领袖们对待“东西古今”文化之争的态度。

最初,面对西方文化对印度传统文化的冲击,印度近代宗教改革的领袖们出于爱国和民族情感,有的提出“印度是印度人的印度”,有的提出“回到吠陀去”,表现出了一种抵制立场。但是,“吠檀多不二论”的极大包容性又决定了他们对西方文化具有吸收和纳入的可容性与可能性。例如被誉为“近代印度之父”的罗姆莫罕·罗易就以西方理性主义和绝对一元论的观点看待传统吠檀多,将“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观念引入到吠檀多哲学中去。又如达耶南陀·萨拉斯瓦蒂竭力用西方哲学术语和科学知识对吠陀进行重新阐述和包装,以使它跟上时代步伐。再如斯瓦米·维韦卡南达在继承传统吠檀多基本原理的同时,又大量吸收了西方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然科学等内容,对传统吠檀多加以改造和革新,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哲学体系,被称为印度新吠檀多主义哲学。

1798年,法国拿破仑率远征军入侵埃及,阿拉伯人民奋起反抗,揭开了阿拉伯近代史的序幕。在近代,阿拉伯社会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阿拉伯以及伊斯兰的复兴问题,而这一问题又与文化领域中的“东西古今”之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面对“东西古今”文化之争,近代阿拉伯伊斯兰社会的主要思想家和改革家们的态度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偏重信仰,以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为代表;另一类是偏重理性,以拉法尔·塔赫塔威、穆罕默德·阿布笃为代表。

所谓偏重信仰,是说阿拉伯伊斯兰的一些思想家将伊斯兰教奉为适宜于每一个时代的信仰,并以伊斯兰信仰反对任何非伊斯兰性质的外来理论进入阿拉伯伊斯兰社会。如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在其名著《答无神论者》中,强调近代阿拉伯伊斯兰社会面临着三种思想的挑战: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迷惑了许多穆斯林的心灵;伏尔泰和卢梭的思想会将阿拉伯伊斯兰社会建立在否认真主的基础之上;西方近代理论如社会主义、虚无

主义等学说威胁着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稳定与秩序。因此,他竭力反对无神论并批判自然主义学说,同时大力鼓吹泛伊斯兰主义,即号召穆斯林要以《古兰经》为主宰,统一在伊斯兰教旗帜下,建立统一的伊斯兰世界。

所谓偏重理性,是说近代阿拉伯伊斯兰有些思想家继承了阿拉伯中世哲学家伊本·路西德的双重真理观,即认为哲学和宗教各有侧重点,信仰和理性是在不同层面的活动,而且理性与信仰不相违背。近代阿拉伯伊斯兰有些思想家本着这一宗旨,用理性主义改革伊斯兰教,注释《古兰经》。他们在“东西古今”文化之争中,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的传入。如拉法尔·塔赫塔威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最早从事译介西方思想与文化的先驱者中最著名的一位学者。他是第一个真正透视近代西方文明的阿拉伯人,堪称阿拉伯的“严复”。他携其弟子共同翻译了《拿破仑法典》等数百部西方著作。他所做的文化传播工作结束了阿拉伯文明的僵化时期,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带入了充满希望的未来。又如穆罕默德·阿布笃认为伊斯兰教同科学是非常融洽的,二者丝毫不相违背,宗教不否定科学,科学也不否定宗教,只是论证的原则和方法不同,而结论是一致的,所以,穆斯林必须学现代科学技术,而不能把它们与宗教对立起来。为了使伊斯兰教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他还认为应该引进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使西方的现代文明适合伊斯兰教的教育。

中国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朝鲜半岛于1850年的“异样船”事件、日本于1853年的“黑船事件”始,先后遭遇西方列强的入侵,这标志着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开始对东亚进行全面侵略。西方的人侵使东亚各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民族危机。就文化而言,伴随民族危机而来的,仍是一场与在印度、阿拉伯世界相似的“东西古今”文化之争。

在中国,“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①这一命题影响其传统哲学两千年的发展并成为一种文化法则。“道”是政治之学,是伦常之学,是天理、心性之学,是“本”是“体”;“器”是象数之学,是器物之学,是功利之学,是“末”是“用”。道、本、体是形而上者,是根本,是不易变动

^① 《周易·系辞传》。

的；器、末、用是形而下者，是从属，是可以变动的。这种思维模式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一种稳定的价值判断系统。当近代中国不断遭遇西方而被迫承认西方的强盛时，除顽固的保守派与激进的西化派外，相当多的思想家开始思考如何保持中国的传统价值又能容忍西方的科学文化的问题。于是重新祭起“形上形下”的价值判断系统，以中国文化为道、为本、为体，西方文化为器、为末、为用，而有了“中体西用”说。

近代以前，朝鲜半岛和日本深受中国哲学的影响，“形上形下”也成为他们的基本价值判断系统。以此为据，朝鲜半岛面对西方文化，提出了“东道西器”说；日本则提出了“和魂洋才”说。可见，“中体西用”、“东道西器”、“和魂洋才”的共性都是以东方文化（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的传统文化）为根本来评判、接纳西方文化。这是东亚文化对待西方文化的一个基本态度。在此基本态度基础上，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各自的做法又不尽相同，由此决定了“中体西用”、“东道西器”、“和魂洋才”的丰富内容。

近代中国对待西学的态度大致经历了早期经世派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早期改革派的“西学中源”（西学东源）→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后期改革派的“中西融会”这样几个阶段。早期经世派作为中国近代哲学的前驱，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作出了激烈反应。其中魏源在《海国图志·序》中明确提出了“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在中西关系方面，他从有用性的角度强调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目的是为了“攻夷”、“款夷”和“制夷”。进而，早期改革派视中西文化的关系为“西学中源”（西学东源）。如薛福成在《出使四国日记》说“凡兹西学，实本东来”。这说明他们努力寻找中国文化中与西学相似或者可以“推本”推出来的东西，力图将中学进行西学似的解释，以达到学习西学、发展中学的目的。洋务派承接这一思想余绪，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理论。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内学即治身心，是中学，是根本；外学即应世事，是西学，是作用。关于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他认为是“旧学（中学）为体，新学（西学）为用，不可偏废”。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洋务派一方

面坚持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文明、先进的,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又指出中国之所以赶不上西方,只是由于器械落后的原因。于是提出要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物并主动开矿山、修铁路、办工厂、发展商业、培养外语人才,以达谋富求强的目的。后期改革派的严复对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中体西用”是一种逻辑错误。他比较注意中西文化之分,指出中西差别在三纲和平等、亲亲和尚贤、尊主和隆民、以孝治天下和以公治天下等,为此提出中国要奋发图强,只能标本兼治。于是,他将西方大量的社会科学著作翻译介绍到中国。严复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同时,还努力融合中西文化。如他认为中国的老庄学说与达尔文、孟德斯鸠、斯宾塞的思想相通。而他的老庄评点明显地试图与西方的自由和民主观念相融会。^① 后期改革派另一位代表者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也具有中西文化融会的因素。

近代朝鲜半岛最初接触西学,是通过实学家在中国看到的西洋文化(西洋科技和书籍),主要是器物之学。在羡慕西洋文化的同时,他们有了接受、学习西方文化的要求。如实学集大成者丁茶山明确表示他的实学就是西方的学问,诸如天文、地理、农政、水利、测量、医疗等。他认为西方文化中的合理因素,恰可以纠偏东国(朝鲜朝)陋儒执于虚玄而使家国民生积贫积弱的弊病。“北学派”实学家朴趾源的孙子朴珪寿在努力将于中国得到的西洋书籍带回本国,积极将在中国看到的西洋科技介绍回国的同时,密切关注当时国际局势的变化,认真思索国家的出路问题。鉴于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他提出了“东道西器”最初的建议。之后的1882年,尹善学在上书中正式提出了“东道西器”论主张。“东”即东国,指当时的朝鲜王朝;“道”即形而上之道,指朝鲜王朝的统治思想——儒教;“西”即西方;“器”即科学技术等。“东道西器”是指在不变革国家政体前提下,努力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之先进科学技术,走富国强兵之路。朝鲜后期这股实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是“开化思想”的形成。“开化

^① 参见辛冠洁、丁建生、蒙登进主编:《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上),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291—470页。

思想”是在朝鲜朝社会面临外势侵略的背景下产生的近代社会的一种进步思潮。其核心人物是金玉均、俞吉浚等人。他们对待西学的态度与“东道西器”论有所区别。由于他们亲身到美国、日本留学,尤其是俞吉浚还有幸得到了日本著名学者福泽谕吉的指导,对于西洋文化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所以他们大胆提出了建设独立自主近代国家的口号。如金玉均的“大更张”理论主张要彻底改革政府,俞吉浚强调开化的主体性,指出自主开化的前提是民族与国家的独立与自由。

近代日本在“东西古今”文化之争中最鲜明的标志是“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这一思想导源于近世的新井白石。白石在《西洋纪闻》中认为西学是“形而下之物”,西学在科学技术方面是优秀的,但在精神、道义的“形而上”层面则毫无可取之处。他的这一西学观深深地影响了后世学者。德川幕府末期佐久间象山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就是白石西学观的发展。“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的核心是“和魂洋才”。“和魂”是道,是体;“洋才”是器,是用。在这种观点影响下,日本近代初期的启蒙思想家西周以自己所理解的西方思想批判东亚的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学;而他批判儒学,并非为了否定和抛弃儒学,而是以西学改造儒学,使之转变为新时代的学问。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的福泽谕吉在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时,他的回答是“宣扬文明”,即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都要引进西洋文明。这实质上是主张“洋魂洋才”。1881年后,他的思想日趋激进,提出了“脱亚论”。他把西洋文明作为日本文明发展的目标,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成功后,成为了亚洲的中心并对近邻中国等采取蔑视和侵略态度。他的“脱亚论”的实质是“侵亚论”。福泽的这种“脱亚论”意识影响所及不只限于日本统治者阶层,而是广泛浸透到了日本国民意识之中,是应该警惕和批判的。与此不一样的是明治哲学家努力尝试东西文化的融合,如井上哲次郎和大西祝从哲学上进行了东西方文化综合的尝试,他们力图将西方哲学的逻辑与东方思想的精神融为一体。可见,日本近代哲学在东西文化之争中,是按着“和魂洋才→西洋文化→东西文化融合”这一途径发展的。至现代哲学,结出了东西文化融合的硕果。

目 录

引 言 001

第一编 南 亚

第一篇 印度哲学(19世纪至20世纪初)..... 003

第一章 印度近代哲学的特点..... 003

第二章 印度近代启蒙思想运动..... 007

 第一节 启蒙思想运动的兴起 008

 第二节 启蒙运动对社会的影响 013

第三章 罗姆莫罕·罗易的哲学以及宗教、社会改革思想 019

 第一节 新吠檀多哲学的先驱 020

 第二节 宗教与社会改革思想 024

**第四章 德本德拉纳特·泰戈尔与凯沙布·钱德拉·森的
 哲学与宗教、社会改革思想 032**

 第一节 德本德拉纳特·泰戈尔的哲学与宗教社会思想 032

 第二节 凯沙布·钱德拉·森的宗教改革观与新宗教说 040

**第五章 达耶南陀·萨拉斯瓦蒂的哲学与宗教社会
 改革思想..... 048**

第一节	“回到吠陀去”的新经典主义哲学思想	049
第二节	宗教改革与社会改革思想	052
第六章	罗摩克里希那的哲学与宗教思想	061
第一节	罗摩克里希那的哲学思想	062
第二节	“人类宗教”说	065
第三节	罗摩克里希那的道德伦理思想	067
第七章	斯瓦米·维韦卡南达的哲学与宗教学说	071
第一节	生平与思想渊源	071
第二节	新吠檀多哲学	073
第三节	关于人的学说	079
第四节	“普遍宗教”说	083
第五节	社会改革与政治思想	088
第八章	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的哲学与宗教社会改革思想	094
第一节	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的哲学与宗教改革思想	095
第二节	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的民族主义思想	099
第九章	罗纳德与提拉克的哲学及民族主义思想	104
第一节	罗纳德的哲学和社会改革思想	104
第二节	提拉克的哲学和民族主义理论	113
第二篇	斯里兰卡等国哲学(19世纪至20世纪初)	123
第十章	近代斯里兰卡佛教思想	123
第一节	近代斯里兰卡佛教的复兴	123
第二节	达磨波罗的佛教思想	126
第二编 西亚北非		
第三篇	阿拉伯伊斯兰哲学(18世纪至19世纪)	143

第十一章 近代阿拉伯伊斯兰哲学思想	143
第一节 瓦哈卜的哲学、宗教改革与社会思想	144
第二节 塔赫塔威的文化启蒙思想	151
第三节 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与泛伊斯兰主义	155
第四节 穆罕默德·阿布笃的宗教改革与哲学思想	162

第三编 东 亚

第四篇 中国哲学(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	183
第十二章 中国传统哲学的近代转型	183
第一节 近代殖民主义对中国社会与传统文化的冲击	183
第二节 中国传统哲学的近代转型	185
第三节 中国近代哲学的主要派别	193
第十三章 中国近代哲学的前驱:早期经世派的哲学思想	196
第一节 龚自珍与近代人文主义的开端	196
第二节 魏源与近代科学主义的开端	213
第十四章 中国近代早期改革派的道器哲学	224
第一节 中国近代早期改革派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危机的 体认	226
第二节 中国近代早期改革派的主要哲学思想	229
第三节 中国近代早期改革派哲学思想的性质和地位	248
第十五章 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宗教哲学	252
第一节 道和上帝	253
第二节 人和上帝	257
第十六章 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哲学	264
第一节 曾国藩的开明理学	264
第二节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哲学	272

第十七章 保守派的传统哲学	276
第一节 倭仁与理学保守主义	276
第二节 经学保守主义与诸子学复兴	281
第三节 杨仁山与佛教复兴	290
第十八章 后期改革派的哲学思想	293
第一节 康有为的大同哲学	293
第二节 梁启超的自由与新民哲学	301
第三节 谭嗣同的近代仁学	308
第四节 严复的天演哲学与实证方法	315
第五节 王国维的人本主义与实证哲学	328
第五篇 朝鲜半岛哲学(17世纪至20世纪初)	343
第十九章 实学思想概述	343
第一节 朝鲜朝实学思想形成的背景	343
第二节 朝鲜朝实学思想的分期	348
第三节 朝鲜朝实学思想的特征	349
第二十章 经世致用派实学	352
第一节 李睟光的实学思想	352
第二节 李瀛的实学思想	354
第二十一章 利用厚生派实学	360
第一节 洪大容的实学思想	360
第二节 朴趾源的实学思想	367
第三节 朴齐家的实学思想	374
第二十二章 实事求是派实学	380
第一节 丁茶山的实学思想	380
第二节 金正喜的实学思想	389
第二十三章 “卫正斥邪”论与开化思想	392

第一节	“卫正斥邪”思想的重新兴起	392
第二节	开化思想与“东道西器”论	396
第三节	金玉均、俞吉浚的开化思想	399
第二十四章	东学思想与近代新宗教	404
第一节	东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404
第二节	近代新宗教的产生与发展	410
第二十五章	爱国启蒙运动者的哲学思想	419
第一节	朴殷植的“儒教求新论”及其爱国启蒙思想	419
第二节	张志渊的“自强论”及其爱国启蒙思想	423
第六篇	日本哲学(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	427
第二十六章	启蒙主义哲学思潮	427
第一节	西方近代哲学初入日本	427
第二节	“明六社”与思想启蒙运动	430
第三节	西周与“哲学”用语的定译	432
第四节	福泽谕吉与《文明论概略》	438
第五节	加藤弘之的哲学思想	442
第二十七章	自由民权运动理论家的哲学观	449
第一节	进化论哲学的传播及其社会功能	449
第二节	植木枝盛的“尊人说”	451
第三节	中江兆民与《续一年有半》	454
第二十八章	东西思想融合的初步尝试	458
第一节	德国哲学的导入与学院派哲学的形成	458
第二节	西村茂树与《日本道德论》	459
第三节	井上圆了与《纯正哲学总论》	462
第四节	井上哲次郎的融合哲学	467
第五节	大西祝的“批判主义哲学”	472

第二十九章 社会主义思潮	478
第一节 明治社会主义思潮产生的基础	478
第二节 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	480
第七篇 越南哲学(15 世纪至 19 世纪)	489
第三十章 后黎朝的哲学	489
第一节 阮廌的仁义与和合思想	489
第二节 阮秉谦的人生哲学	493
第三节 《洪德法典》的法哲学思想	502
第四节 黎贵惇的哲学思想	508

第一编
南 亚

第一篇 印度哲学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

第一章 印度近代哲学的特点

印度近代哲学产生于 19 世纪初,发展和兴盛于 19 世纪中叶和下半叶,延续近百年的时间。它是与印度近代宗教改革运动、社会改革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相伴随的。因此,印度近代哲学家绝大多数都不是纯粹的哲学家,而是当时著名宗教改革家、社会改革家或民族运动初期的领导人。除了斯瓦米·维韦卡南达(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的创始人)有一个系统的哲学体系,算得上一位完整的哲学家之外,其他的人都没有一个系统的哲学体系。大多数近代哲学家都是以宗教改革社团创始人、社会改革家或民族运动领袖的身份出现在印度的各种历史和政治著述中,他们的宗教、社会和政治思想占据着主要地位,而哲学思想则处于次要的位置。这就给印度近代哲学的研究工作和寻找资料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即使找到他们的原著,也很难发现较为系统的哲学阐述。当然,这种现象正反映出印度近代哲学的一些特点。

尽管多数近代哲学家没有系统的哲学体系,但是在他们有关宗教改革、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的论述中却可以发现大量有价值的哲学思维和哲学观点,这些哲学观点代表着印度近代的时代精神,代表着那个时代最深刻的思考。从这些观点中,可以发现印度近代哲学有如下几个特点。

* 朱明忠撰。